

张玉春 主编

古文献与传统文化

华文出版社

张玉春 主编

古文献与传统文化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文献与传统文化. 第13集/张玉春主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075 - 2171 - 9

I. 古… II. ①张… III. ①古文献学—中国—文集 ②传统文化—中国—文集 IV. G256.1 - 53 K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1541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 63370164 (010) 63370169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880 × 1230 1/32 开本 13.375 印张 360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5.00 元

《古文献与传统文化》编委会

主 编 张玉春

编 委 汤开建 张其凡 程国赋

 范立舟 陆勇强 陈文源

执行编辑 陈才俊 郑可敏

前 言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创刊于 1990 年，作为本所教师及研究生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和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的窗口，至今已出版 12 集，共刊载学术论文 234 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各时期的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些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继承弘扬传统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88 年，研究所为了给本所教师开辟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决定编辑出版一部学术论文集。根据本所的研究方向和队伍构成现状，论文集定名为《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1990 年出版第 1 集，至 2004 年出版第 11 集，均冠名为《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读者通过阅读这 11 集所刊载论文的内容，大致可以体察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学科建设和研究方向发展的轨迹。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成立于 1984 年，是在原“宋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其后，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充，相继成立了岭南学术研究室、宋史研究室、港澳台文化研究室。此阶段《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所刊载的论文，基本是围绕这

三个研究方向而展开，并逐步深入、扩展，在凝练方向、锻炼队伍、培养新人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98年以来，本所在原有的古代史硕士授权点的基础上，又先后获得了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博士授权点；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并与中文系共建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学科建设有了新的发展，研究队伍的学术构成产生了新的变化。为了适应新发展和新变化，我们整合队伍、调整结构，组建了古典文献与文化研究室、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室、港澳台及海外文献与文化研究室；确立了依据古代文献，阐述弘扬传统文化为本所的总体研究方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开全方位、多侧面的研究。

为了更鲜明地体现本所的研究方向与研究特色，我们决定自第12集起，将《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更名为《古文献与传统文化》，使之更贴切地成为展现本所学术风貌的窗口。我们将继续遵循《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的办刊宗旨，不断提高所载论文的学术水准，使《古文献与传统文化》为弘扬传统文化、为提升本所的学术影响，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玉春

2007年6月于暨南园

目 录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学文献考索	王 祎 张玉春(1)
论《史记》中的人物容貌与人物形象类型 ...	江 君 张玉春(17)
从目录学看先唐传记地位的嬗变	史素昭 张玉春(27)
唐代皇位继承的特征及其成因试探	黄日初 范立舟(37)
宋真宗朝寇准与丁谓争斗事实考述	张其凡 刘广丰(49)
宋代岭南谪宦表(下)	张其凡 金 强(89)
安多吐蕃史四札	汤开建 吴玉娴(122)
天王多闻	
——唐、宋代的“毗沙门天王”崇拜	王 颢(149)
论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互动	范立舟(165)
宋元时期藏区寺院经济发展的原因	杨惠玲(180)
关于元代硬译公文的点校问题	屈文军(201)
关于《大德南海志》的几个问题	陈广恩(221)
《明实录》等文献载录贡使回回辑述	马建春(230)
明成祖出兵安南原因辨析	陈文源(267)
三言二拍选本考述	程国赋(278)

清代若干作家的文集、疑年及相关问题考述	陆勇强(298)
段振举地亩案始末	张 彧(320)
1840—1860:鸦片战争后澳港基督宗教关系	叶 农(342)
晚清时期的中西彩票	赵利峰(353)
近代美国长老会在粤民教冲突与教案研究	颜小华(374)
中西文化交流“共赢”个案研究	
——以中国教会大学建筑为例	陈才俊(390)
文化会通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尝试	
——兼论马相伯的教育哲学理念	陈才俊 林俊敏(407)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学文献考索

王 祎 张玉春*

班固据《七略》“删其要”而成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周至西汉时期的“小学类”著作凡十家，十二种，四十五篇。分别是：《史籀》十五篇、《八体六技》八篇、《苍颉》一篇、《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训纂》一篇、《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小学类文献作为经部的附庸是整个学术史的主流。遗憾的是，这些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后人无法根据这些文献对文字学史，进行溯源导流。因此，研究它们意义重大。

一、周秦时代的综合字书

周秦时代的字书，是早期的学科之一，本该带有早期文化形式分化不明显的特点。然而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却往往忽视这一点。比如王国维先生认为“《史籀篇》是字书之祖”^②。严正先认为《八体六技》是古今字体^③。对错暂且不论，无论哪种说法都未考虑到文化的时代

* 王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博士生；张玉春，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② 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载《观堂集林》（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1页。

③ 严正《〈汉书·艺文志〉著录小学类文献研究》，载《图书馆界》，2005年3月期，第22页。

性，用后世的思维将周秦时代的字书职能作了明确的界定。下面我们依据两次出土发现，对周秦时期字书职能的“多样性”进行详细论证。

1. 史学童教材《史籀篇》

《史籀篇》是《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著录的第一种。叙录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①这段记述表明，《史籀》十五篇，大篆字体，是周宣王太史教习学童的教材，突出了《史籀篇》的识字性质。学术界虽多从其说，可惜均未能论之以据，考之以详。上海博物馆入藏的周厉王十九年标准器，给《史籀篇》作者、成书年代提供了新的证据；而1983年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公布的汉简《史律》，则对其性质作了进一步补充。

“玛鼎”，藏于上海博物馆^②。高三十八点九厘米，立耳深腹，蹄足，口沿下饰两道弦文，为周厉王十九年标准器^③，鼎铭文中“史留受王令书”字样。李学勤先生^④、何琳仪先生^⑤均考证当即史籀。周宣王是周厉王之子，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留完全可能在两朝为官，因此说史籀是周宣王太史，而且征之铜器铭文，结论更加确定。又根据“《说文解字》所收籀文字体与石鼓文和春秋时代的秦国金文相同，而与周宣王时金文不相似的事实”^⑥得出如下推论：《史籀篇》编写的时代应该是在周宣王时，但许慎所见者已非原貌，而是用春秋时秦国文字所抄写的本子，字体已由西周金文改为大篆，因此《汉志》所载籀文，字体是

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9页。

② 陈佩芬《繁卣、玛鼎及梁其钟铭文诠释》，载《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2期，1982年。

③ 马承源《晋侯稣编钟》，载《上海博物馆馆刊》第七期，1996年第一版。

④ 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8页。

⑤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0页。

⑥ 刘志成《汉字学》，天地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大篆。

1983年发掘的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墓，共出土十三支简。最后一支简有“史律”二字，是这组简的自名名称。主要内容为西汉初年（BC186）实施的法律。篇幅虽然不大，却多处和《史籀篇》有关，是讨论史籀篇的典型材料。我们把汉简《史律》和地上文献结合起来看，可以证明：《史籀篇》不仅是当时考课史学童、选拔史的专用识字教材，而且兼有专业知识用书的双重性质。

其一，《史律》四七五——四七六号简云：

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讽书五千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太史，太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宜人以为尚书卒史。^①

后世的三部文献《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叙》和《北史·江式传》也有类似记载。如《汉书·艺文志》：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书或不正，辄举劾。”^②

其他二处只是字句上有不同，文意与此相似，不冗录。

合比这四处史料，可知“十五篇”是指《史籀篇》。《汉志》注录“《史籀》十五篇”，所以《史籀篇》可以省称“十五篇。”《汉志》中的“六体”是“八体”之误。而且律文表明，史学童要连续进行两次选拔，先试《史籀篇》，再试“秦书八体”。秦书八体是指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③两次测试内容有重复部分（都有大篆），故此推测应各自有所侧重。

其二，与四七五——四七六号简文结构相似的还有两处简文：

①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0—1721页。

③ 许慎《说文解字·叙》，徐铉校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卜学童能风（讽）书史书三千字，微卜书三千字，卜九发中七以上，乃得为卜，以为官处（？）。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上计六更。缺，试修法，以六发中三以上者补之。

——四七七——四七八号简

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太祝试祝，善祝、明祠事者，以为冗祝，冗之。不入史、卜、祝者，罚金四两，学俾二两。

——四七九——四八〇号简

这三处简文，平行对应，整体阅读，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卜学童考卜书，祝学童考祝书，史学童考的是史书。这是汉法律的严格规定。何谓“史书”？文献征引多见。《汉书·元帝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颜师古注“史书”引应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①《后汉书·孝安帝纪》：安帝“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李贤注：“史书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书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②简文中的“史书”应与之相当。既然，不同职业的卜、祝、史选拔需要分科考试，那么这三科教材也应各自有所侧重。当代赵平安先生认为《史籀篇》中应含有史所必须了解的专业知识，是很有见地的。^③

其三，《史律》还有一段提到：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俾将诣太史、太卜、太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④

——四七四号简

① 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第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9页。

② 《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3页。

③ 本部分参考了赵平安先生2002年在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与台湾楚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上海博物馆协办的“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新出汉简与〈史籀篇〉的性质（提要）》一文。

④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据此得知，史学童十七岁开始学习（《史籀》），学时三年，之后参加史官选拔考试。可是，在十七岁之前，学童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學習经历。如：《汉书·艺文志》中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① 六书就是分析字形、学习字形的学问，自八岁至十七岁，若经过长达十余年的文字学习，仍然学习识字教材的《史籀篇》，未免不符合教育规律。也许有人会说，十七岁后学习的是与史有关的专业字词，那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重复。可能的解释就是：八至十一岁为初级学习阶段，学习六书，识字任务为主；十七岁至二十岁为高级学习阶段，除进一步扩充与史相关的字词外，也会涉及专业知识的学习。譬如《礼记·内则》所记西周时期学童受教育状况：“十三舞勺，学乐诵诗；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舞《大夏》，始学礼。”注曰：“成童，十五以上。”^② 这段话讲的是西周贵族子弟在不同的年龄段，要接受不同的教育培训，由浅至深，由易到难。看来，循序渐进的分段教育意识，先秦时期已十分普遍。

汉简《史律》的出土，使我们对《史籀篇》的性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它不仅仅是一部童蒙的识字之书，同时也含有史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读者或许有这样的疑问，既然不是纯粹的字书，那它为什么会被置于小学类首位？我的理解是：从发生的角度讲，任何学科开始时都是综合的，亦如原始时代的“诗、乐、舞”三位一体，字书也不例外。周秦时代恰是我国字书的萌芽期，如《史籀》《八体六技》，都兼有有识字教材、字体范本、专业知识等综合性质。

2. 字体之书《八体六技》

《八体六技》列于《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史籀篇》之后，《苍颉篇》之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艺文志》著录相对清晰，学人对“八体”指称比较统一。

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0页。

② 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58页。

颜《注》引韦昭曰：“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许慎《说文解字·叙》也云：“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①

即“八体”就是秦朝使用的各种字体，而对于“六技”的内容则分歧较大。

王应麟曰：“所谓六技者，疑即亡新六书。乃古字、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②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叙云：“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之字，摹印章、书幡信也。”^③

关于“八体”和“六体”的关系，谢启昆《小学考》解释说：“八体六技，当是汉兴所试之八体，合以亡新改定之六书。技字似误。汉兴所试，用秦之八体，不止六体，许氏《说文叙》甚明。班《志》叙论以八体为六体，深所未喻。”

李庚芸则认为：六技当是八篇之伪。小学四十五篇，并此八篇，正合四十五篇之数。^④

案：李氏之说甚是。首先，从次序看，先是《史籀》十五篇后，继以秦之八体，然后及《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别字》之属，先后次序不混。若是新之六书，则时间不连贯。

其次，从篇数看，《艺文志》著录小学四十五篇，只有认为“技”是“篇”之讹，才能加合成四十五篇之数，否则无法解释篇数问题。

最后，从《汉志》通例上来看，所著录的十二种作品，全部是先注篇名，然后注篇数，《八体六技》也没有例外的理由，所以“技”是“篇”之讹。“八体六篇”才符合《汉志》全书用例。张舜徽先生

① 许慎《说文解字·序》徐铉校订，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页。

②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③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

④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1页。

推断：“新之六书，与秦之八体，大同小异。徒以王莽意在复古，应制作。不欲袭秦故，遂别立名目耳。其书亦称六体，而未有称六技者。班《志》既著录《八体》于《史籀》之次，自必有其卷数。”^①实乃圆通之论。

综合上述分析，《八体六技》就是“秦八体”，是一本涵括了秦时使用诸体的字书，既有识字功能，又是各种字体的范本。

二、西汉识字之书与释字之书

从西周至班固所处的汉代，社会、文化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完善，一方面要求思维的载体之一文字，数量增加；另一方面，汉字形体自身也发生较大演变，异文颇多。加之，西汉古文经学初露端倪。在这几方面合力作用下，字书不仅不断地删旧补新以适应社会表达的需要，而且出现了注解性的释字书，以解决人们阅读的困难，促进统治者“书同文”政策的推行。

1. 识字书《苍颉篇》与字体书《急就篇》

(1) 识字书《苍颉篇》

根据《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苍颉篇》的叙可以对《苍颉》一书的成书缘由、作者、时间、字体、分合等情况有个大致清晰的了解：

《汉志》小学类叙云：

……《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汉兴，同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又云：“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序

^①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苍颉》……。

这两段内容非常清楚地讲出《苍颉篇》的成书过程和性质：秦时，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编写《苍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内容文字上多取《史籀》，用小篆写成，为秦时识字之书。汉初，民间书师将三篇合一，统称《苍颉篇》，一称“秦三仓”，断六十字为一章，计五十五章，约三千三百字。后扬雄取“小学家于庭中所记之可用者”作《训纂篇》，顺续《苍颉》。成为西汉时书同文的范本。这种说法与许慎《说文解字·叙》中的记述相互照应：“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① 意旨甚明。

此外，模仿这一类书的有《凡将篇》《元尚篇》《急就篇》等，其他诸佚，今仅存《急就》篇。

(2) 字体书《急就篇》

《汉书·艺文志》小学类叙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入矣。”^② 这段记述表明：《急就篇》由史游以草书体编成。南朝宋王愔《文字志》解释了《急就》成书的原因和所使用的字体：“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③ “解散隶书，粗书之”，是草书的早期特征，后世称作章草。唐朝张怀瓘在其《书断》中，据王愔的记载来确认史游是“章草之祖”。所谓“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④ 《急就篇》最初是用章草写出，只是见于记载，没有确切的证据。周祖谟先生按文字史的

① 许慎《说文解字·序》，徐铉校订，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页。

②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1721页。

③ 张彦远《中国美术论著丛刊——法书要录》（第七册），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

④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急就篇》下按语，收入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916：史部·目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常理推断，认为当初应该是隶书的面貌。这两种说法，在出土文物中都得到了证明，“汉简中，就有书吏用隶书抄写的《急就》。在东汉砖文里，也有工匠用潦草的隶书体态刻画的《急就》。而西域出土的晋文书残纸中的《急就》一纸，有隶书、章草各数行。”^① 推测起来，当是汉晋之际草书大行，晋人以隶、草二体写《急就》，恐是汉时旧本的传写，隶书方便于识字，草书无异于法帖。

关于《急就篇》的功用，宋代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有较为清楚的总结：“凡三十二章，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②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按语则从对后世书法家影响的角度作了补充：“……是篇盛行于汉魏六朝，历代书家……皆尝传摹其书，流行甚广……”^③ 不仅唐以前很受欢迎，形成了“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④ 的景象。而且，后世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和它有渊源关系，都是汲取了《急就篇》的经验而发展而来的。

因此，对于《急就篇》一书的性质功用，我们尝试得出这样的结论：《急就》，是一部以章草写就，顺应当时人们追求便捷的手写习惯，为后世广泛传摹的字体之书。

2. 扬雄编写、续补、训诂的系列作品^⑤

《汉书·艺文志》明确注明作者为扬雄的作品有两部：《训纂》一篇、《苍颉训纂》一篇。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两篇同为扬雄的作品，却没有连续著录。不符合《汉志》“同一撰人的作品连续著录”的通例。其中还隔有《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都未注明撰

① 刘涛《古代的识字书与书法》，载《书法学刊》，2005年第6期。

②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③ 同上。

④ 史游纂，钮树玉校：《校订皇象本急就章·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⑤ 本部分思路参考了束景南《〈别字〉即〈方言〉考》，载《文史》第39辑。